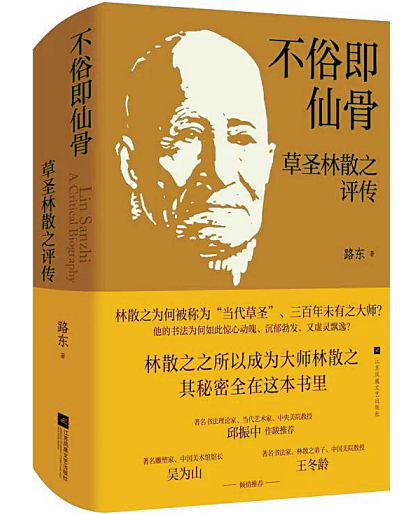


好书摘读

林散之是如何成为一代草圣的



朱君

路东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对林散之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其一，他与传主是同乡，珍爱这位乡贤。其二，路东的境遇与林散之当年相仿，都怀揣高远的文化理想。

《草圣林散之评传》分十一卷，以时间为经线，以传主经历为纬线，在社会生活、心态情感、文化观念里还原历史现场中的林散之。这种复盘并不轻松，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需要大量的细节支撑。

为此，路东做了大量的板凳功夫，他研读了林散之所写的时间跨度长达七十几年的诗、书、信札、日志文献，遍访了林散之尚健在的发小、家人、老师的人以及散落在南京、浦口的传主遗迹，甚至传主家人都不知晓的林散之旧事、心路历程他都依据充沛的省察在心，单凭这坐板凳的功夫深度就足以让人对这部评传放心。

更让人钦佩的是作者对林散之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作者通过若干细节进入传主的精神世界，洞察传主的复杂与独特之处。用具体生活撬开了林散之个人史的历史真实，这也是这部书的精到之处。作者用这样一个视角做工具，真实的林散之就来得自然而然，毫无刀斧痕迹。

林散之生于辛亥之年，戏谑“我出生于变法之年”，暗含自己承载变法的天命。从大师林散之开一代草书风气的事实来看，林散之的确以“其命维新”为己任。但在文化观念上，林散之却是“吾道一以贯之”典型的“文化守成”者。

在林散之的几位启蒙老师中，对林散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清朝最后一批进士张栗庵，辛亥革命后，张栗庵断仕途，回乡行医谋徒。张老先生对中国文化先贤的敬意甚深，文化修为了得，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显得格格不入。

在张栗庵藏书斋“观复堂”里成长起来林散之，在文化取向上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林散之和他所处时代的文化风尚并不契合，评传中虽然没有直接谈及林散之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但厚古薄今的思想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林散之好诗，写了一辈子的旧体诗词，他毕生拒绝写新诗，而且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他的观念不合时宜。他与个性大相径庭的高二适之所以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具有同样的文化守成立场。这些细节流露出传主的文化倾向。

大时代下，林散之不为人知的文化坚守与抗争，被作者路东曲笔潜藏在平静的水下，而静水深处流着林散之的困惑、纠结、倔强、偏执和不甘。传主强烈的文化守成倾向，是作者的重要“发现”，也是最易出“戏”的地方。作者用一个一个的事件、一个一个的细节披露出来，在细碎、片段化的叙事中描绘出传主的心形。

表现林散之艺术观念如此，表现林散之的生活观念也是如此。作者用“生活智慧”总揽，还原“我志欲方，我行喜圆”的林散之。林散之的儒道释入骨，目光如炬，明辨是非，基本操守绝无问题。此外，林散之还是一位“生活智慧”的大家，他谨言慎行，守常明变，不立危墙之下。

兵荒马乱的年代，林散之虽厌恶军阀、势力人物，但仍与他们周旋往来，并接受了省临时参议礼遇。类似的故事贯穿全书，只要把散落在各章节中的各种细节串联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左右抽旋冀免祸”的林散之，极具“生活智慧”。就这样，作者一点一滴接近林散之、深入林散之的内心遭遇，理解林散之。回首风雨路，黑白相济的林散之凭借生活智慧走出了各种危险，让读者为之暗自吃惊，也暗自庆幸。

（本文摘自《不俗即仙骨：草圣林散之评传》序言，路东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是历史图像中的几块拼图 服饰研究



谢大勇

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已经正式退休了。不记得曾经报过的选题，甚至不相信已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在出版社编辑来京拜访申报项目时的主编李之檀老先生时，我也一起去探望，谈到这个选题时，老先生觉得力不从心。可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老先生还是答应下来，我自然也无法推脱了。

我照例还是从目录入手，用了两个月整理了一份《服饰文献线刻图目录》，结果让我有些吃惊，自汉代到清代、民国，大约遴选出六十余部文献，大致有几千张图像，内容十分庞杂。这还不包括一些文学作品的插图以及类似历代仕女图之类的艺术作品。

就在这时，李先生忽然病倒了，医生和家人都说老先生已经不宜再做文献的整理工作了。李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准备了一些资料要移交给我，这让我更觉得负担沉重。

2018年底前我们开始了写作。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首先是调整好图像与文献的关系。

图像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往往洋洋数千字描述让你头昏眼花不得要领，可一幅图却能使你豁然开朗。可是对于图像也需要具体分析，例如对于古代绘画研究者来说，图像就是第一手资料，而对于服装服饰，我们还必须解读出图像背后的历史信息。而要对图像进行解读就需要两方面的功夫，一个是对原文献的认真解读，另一个就是对原著所处时代背景资料的掌握。

当然无论怎样都需要先看图。看也是一门学问和技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论，一种美学观念、哲学思考。同样的文献和图像有实录的、有抄录的、有道听途说的、有信手拈来的，需要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去甄别和研判。对于古代文献及图像要正确、客观、完整地理解，离不开对原文及图像的解读，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学习，更离不开对于所讨论问题的思考与把握。

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相比，其中有关服饰的分量并不突出，在与服饰相关的古籍之中，带有线刻图的也不占多数。带有插图的古代文献则大约从宋代开始才大规模流行起来，这与中国绘画史以及印刷术有关。即使如此，要想把这些线刻图梳理一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次是处理好服饰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关系。

服装从本质上是物质文明的一部分，向内探究是服饰—身体—内心的自我表达，往外扩展则是与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百姓生活、审美观念等发生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我们力图以服饰为切入点，使读者窥见彼时社会的全貌，引发读者对于物质文明的进程与成果的关注和思考。

以前做服饰文化，大多以服装历史为主线，聚焦于服饰的形制、款式、色彩等，叙述服饰的历代变迁与沿



革。所以遇到把服饰融入历史大环境之中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人们的质疑：这个与服饰有什么关系啊？如今我们不但要研究服饰与哪些方面有关系，更要探讨的是，都有哪些方面与服饰有关联。随着对物质文明的认识，我们试图将服饰作为一个棱镜，通过历史的光线折射出政治变革、军事演进、经济前行、技术进步、宗教发展、民俗渐变、社会改良的七彩光芒。服饰研究是整个历史图像中的几块拼图，我们应该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以还原或接近历史的轮廓。

如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织机是那么多样，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织工的坐姿，一眼就分辨出哪个是织云锦哪个是织宋锦的机械；令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一百多年前古人对于藏族居住、穿衣习俗的描述，居然在现代得到分毫不差的印证；你了解珍珠的贵重，不一定知道古代采珠人的艰辛，而古代到近代潜水服是如何演变呢……

最后是把握研究与普及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古代文献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在文中尽可能多地提供文献原有的图像，以便于读者通过本书更多地了解古代文献。对于图解，我们将尽力写出我们对图像的解读，而不是给读者一个看似简单的答案，虽然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我主张不采用看图说话的方式去完成这本书，过去有些服饰图像研究更多地给出一个符号化的答案，却限制了读者的思考。我们力图找出历史中服饰文化的种种线索与现象，与读者分享我们的剖析方法和分析思路。

本书采用“说人”“说书”“说图”的结构，将作者和成书背景与叙事部分分离，采用这种方式的一个原因是适应本书为多名作者集体创作，另一个原因就是方便读者阅读。

近年来服饰文化研究的影响逐渐扩大，逐步为外界所重视，这与服饰文化的普及是密不可分的。我和李之檀先生一直认为普及才是提高的关键，因此我们力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叙述我们的观点。学术问题大众化和普及化对一个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应该是有推动作用的。

唯愿我们所做的能引起你的兴趣，引发你的思考和联想，能够达到探索古代服饰文化底蕴的彼岸。

（《中国古代服饰文献图解》谢大勇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

一片非同寻常的旷野 ——谈谈乡镇地域文学作品集《相公堡》

庙食于此，宋南轩张子（张栻）有记。后圯，移祀士鼓书院。”后者“在城东七十里束江右岸，武侯督赋潇湘，常（尝）舣舟信宿于兹，土人立祠于江泉，名曰相公浦（堡）祠。”到了明清两代，邑人再开墟场建集市，因而得名相市。

千百年来，以滩名嵌入一副上联至今无人能对者鲜矣，“相公堡，相公滩，相公坐船相公撑”，很可能就是一个孤例。束水河边的相公堡古渡口，不但在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冬十二月迎迓过诸葛亮，也在唐代大历五年（770年）夏四月，见证诗圣杜甫经此前往郴州投亲，停船登岸凭吊贤相武侯侯。明末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十四日，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乘月随流六十里，泊于相公滩，已中夜矣，盖随流而不掉也。”

相公堡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奇，也是现代诗歌地理的一个标志，闻名世界的诗魔洛夫先生的胞衣地即在这儿。

我少时居茅洞桥即闻相公堡名声。第一次去那儿是2010年4月30日。那天上午，我们到了离镇上两三里路的燕子山，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属于湘南宅第型的古民居建筑“洛夫旧居”。

第二次应邀陪同洛夫先生夫妇，这是他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还乡，时在2012年10月30日。

接下来的一次却是伤心之旅，2018年3月19日凌晨3点21分，九旬诗翁猝然病歿于

台北荣民总医院。第三天，世界诗歌日，我和衡阳市的一些诗人作家手持黄色的菊花，沿着洛夫当年读私塾和小学的山路，汇聚燕子山洛夫旧居，深切缅怀从此出发的这位世界华文诗坛泰斗、文人书法大家。

2019年11月30日，台湾知名诗人刘正伟博士来游衡阳，我与诗人罗诗斌、夏夏、以及画家罗杨彪，陪同他到相市乡洛夫旧居参观。又到官塘孔明塔。到洛夫父母合葬的罗家湾墓地时，我同样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响头。

新近的一次是去年11月2日，根据相市乡党政主要领导肖明剑、周丁山的要求，我邀请水运宪、梁瑞郴、刘克邦湖南十几位散文名家，走进相市为陈学阳主编的《相公堡》一书采风创作。

湖南散文名家相市采风过后没几天，篇篇美文即陆续见诸报刊，从根本上保证了《相公堡》散文一辑的高水准。在此之前，定位于乡镇地域文学作品集的《相公堡》，编委会已面向全国征稿，由于衡阳是中国现代新诗的重镇，更兼天南海北实力诗人的助阵，新诗这一辑质量不错。旧体诗词与楹联这一辑也表现不俗，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行文至此，且以八旬诗翁旷瑛炎老先生《渔歌子·相市秋日农家》作为结尾：“束水河边白鹭飞，山村客听鸡鸣啼。粮满地，果成堆。开怀对饮一杯杯。”

（《相公堡》陈学阳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书里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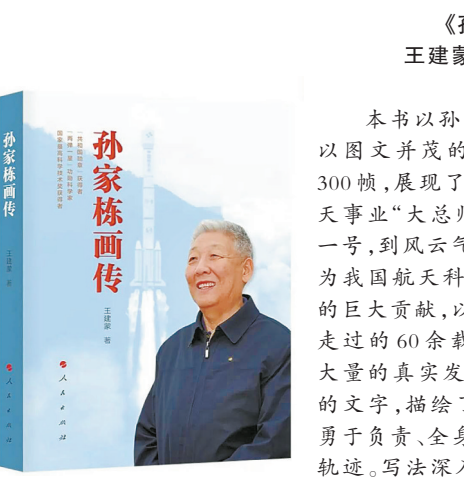
甘建华

屈指数来，我已前后五次走进衡南县相市乡，一次比一次印象深刻，一次比一次感觉美好，相信还会有更多次的旅游观光放飞心情。

作为一个文化地理学者，我自然会首先关注相市乡的区域概况。这个衡南县23个乡镇（街道）目前唯一的一个建制乡，位于衡阳城区东南面三十余公里处，向来是一个人烟辐辏、商贾云集的码头，曾有“束水河上千帆发，相公滩头贾百家”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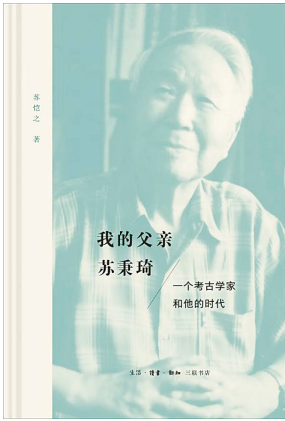
相市古称相公堡，传说与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有关。衡南县前身是清朝的清源县，清朝之前及民国年间，则与衡阳县合为一县。据乾隆《清源县志·卷五·营建志·祠祀》记载，衡阳旧时有两个武侯祠，一个是诸葛亮武侯祠，一个是东武侯祠。前者“原在临蒸驿左，昭烈（刘备）收荆州时，武侯（诸葛亮）驻临蒸，调赋以观军实，故

《孙家栋画传》
王建豪著，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孙家栋院士的生平为线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包括珍贵照片约300帧，展现了孙家栋院士作为我国航天事业“大总师”，从东方红一号、嫦娥一号，到风云气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一次次飞跃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伴随新中国航天事业走过的60余载风雨兼程路。本书通过大量的真实发射场景记述和朴实无华的文字，描绘了孙家栋院士无私奉献、勇于负责、全身心投入航天事业的人生轨迹。写法深入浅出，将航天奥秘描述得通俗易懂、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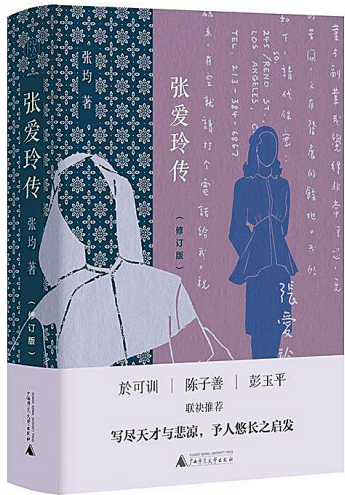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苏秉琦》
苏恺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分前、中、后篇，将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学术和心路历程分为起步、积蓄、爆发三个阶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记录。他幼年时，家庭颇为富裕；青年时北上求学，走上了考古之路；中年随北平研究院迁到昆明；“文革”时期，家中变故，师长和朋友们相继离去；老年时，厚积而薄发，《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集学术大成之作。苏公一生，见证了考古学古学的发展历史；书中描写的重大事件、涉及的和苏公同一时期各学科的代表人物，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我写我书

我眼里的张爱玲



张均

关于张爱玲，我们不是说得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太多渲染、重复她作为一个天才女子的“传奇”，而太少将心比心地探寻她在现实中、作为生活着的、感受着的女性所经历过的内心的光芒与黑暗。

我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张爱玲所经历过的美好的和不那么美好的岁月与生活。也许你并不熟悉“这一个”张爱玲，但这恰恰是我希望的。我未必以传奇与佳话为目的，我尝试理解。

为什么人们会说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最为彻底的唯美主义者”？张爱玲一生都在追求完美，追求极致，这既是《传奇》魅力之所在，亦是她个人婚姻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更是持续至今的“张爱玲热”背后深刻的文化心理内蕴。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的其他一些作家与诗人，譬如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等，创作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唯美倾向，但人生态度却远非张爱玲那样彻底。张爱玲的唯美态度与她观察人生、世界“眼光”的分裂有关。她的这种“眼光”极为个人化，早在童年父母离异之即便已出现，别人很难和她一样。

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集《传奇》与散文集《流言》，最初是作为新文学的“异数”出现的，但到20世纪90年代它们已被人们承认，评价颇高。那么，张爱玲小说与散文的艺术魅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张爱玲杰出的艺术才华，在于她为20世纪40年代亦新亦旧的中国生活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又从这种形式中衍生出某种六朝挽歌般的悲凉美感：一边是古旧中国的精致情调与喧哗声响，一边是现代人独自孤独的荒凉体验，两者交融，塑造出特殊的美感形式。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

张爱玲与胡兰成历时三年有余的婚恋，以轰轰烈烈始，以决然绝告终，这场乱世之恋对她后来人生态路影响非常之大。尽管张爱玲一生著述从未就此提过只言片语，但与胡兰成感情的破裂深深地损毁并改变了她的人生态度。1944年他们开始相恋时，张爱玲对外部世界是抱有很多热烈想象的，希求从外部世界求得人生的极致与完美，1947年后，张对自我以外的一切则抱失望感受，开始转向较为纯粹的内心生活。这也是她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喜以奇装炫人，好在杂志媒体上大出风头，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却迅速淡出，到晚年索性闭门不出，与世隔绝，前后判若两人。

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沉默年代”里，曾与当时颇有前途的青年导演桑弧相识相交，但她为什么又对好心人婉转的示意，“摇头再摇头”呢？她的确很识年轻才子具逸群的桑弧，但她没有机会。这中间埋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痛。作为一名被伤害过的女性，她经历过所有妇女共同的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张爱玲差不多被人“遗忘”了，事实上她仍创作了一些长、短篇作品。

张爱玲虽然曾经是璀璨夺目的旷世之才，但20世纪50年代之后，漂泊海外、孑然一身的她亦不得不接受普通人的命运，为衣食生计而奔波，她这时期的小说剧本多是商业性的。这点她自己很清楚。

晚年张爱玲离群索居，最后又无声而去，她在去世前长达二十余年的幽居岁月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呢？如何理解张爱玲晚年的境界呢？如果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女子在银色的月光下，起舞、飞扬，又悲恸低回，最后缓缓旋起，慢慢化入一片平静澄明的月光，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张爱玲经历过的内心旅程以及她晚年淡如止水的心境。

其实到20世纪80年代，她的独异艺术才华已被逐渐承认，声誉日显，但她谢绝一切邀请与访见，宁愿沉迷于“海上红楼”而遗世忘形。她以平静的姿态接受了时间和命运。她选择了一种自己与自己对话的生活方式，一种沉湎于想象与记忆的唯美姿态，于灿烂之处归于平静。

（《张爱玲传》张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